



“持钎人”雕塑矗立在路旁，显示着铁西昔日的工业辉煌。

新铁西遇见老铁西

本报记者 刘旭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2018年9月下旬的一个午后，沈阳阳光灿烂。65岁的李向东驱车从老铁西区向西奔驰，鳞次栉比的高楼和繁华热闹的商圈，不断从车窗外闪过。

“想看铁西区的变化，一定要沿着北一路向西到铁西新区。”李向东望着窗外的风景说。

半个世纪前，这里烟囱林立、机器轰鸣，沈阳市超过80%的国有企业聚集于此。中国的第一枚国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辆内燃机……铁西区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数百个第一，被称为“东方鲁尔”“共和国工业长子”“中国重工业的摇篮”。

曾经的辉煌，在城市仍有印记。保工街、卫工街、肇工街、重工街，车子经过一条条以“工”命名的街道，“持钎人”“力量”等雕塑矗立在路旁，散发着昔日的工业气息。

当车子开进铁西新区，笔直的街道、茂密的绿荫映入眼帘。崭新宽敞的厂房，一个连着一个，沿着马路依次排开。16年前，在经历了没落与阵痛后，铁西区借“东搬西建”战略开启了浴火重生之路。

如今，这片曾经的荒地上，坐落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形成了企业规模宏大、工业门类齐全的装备制造产业。在中国有能力制造的24类210种成套设备中，铁西区占了三分之二。

李向东是地道的铁西人，一家五代人生活在这里，绝大部分家庭成员是铁西职工。他的父亲当过人人羡慕的八级工，当时以108元的高月薪养着全家7口人；他和几个弟妹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再就业；他的儿子、外甥在外受过高等教育，回到家乡成为新时代的技术工人。

在过去的40年间，一家三代铁西人经历的点点滴滴，串联起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记录下了国企职工的命运沉浮，更写就了一部不断改革创新的进行史。

那时候，在铁西当工人牛气

李向东至今还记得自己刚成为一名工人时的情景。

1968年，他15岁，高中马上要毕业。沈阳鼓风机厂来学校挑工人，整个年级只有5个名额。因为成绩优秀，他是班里唯一被选上的学生，“心里美滋滋的，别提多开心了”。

在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第一城小区的家中，李向东翻出当时的老照片。照片中，15岁的他身穿崭新劳动布吊带裤和白衬衫，抬头挺胸。“那时，沈阳街头最流行穿工装。只要上街，我就穿上，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更重要的是，当工人倍有面子、光荣。”

最让李向东难忘的是铁西工人下班时的盛况。钟声一响，30余万身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潮水般涌出。一辆辆自行车挤满北二马路、保工街沿线的各个十字路口。挂在车把上的铝饭盒，随着车子的颠簸叮当作响。

李向东的二妹李向红、三妹李香琴、三妹夫董志国和四弟李卫东都在工厂上班，是典型的“工二代”。

“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像我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劳动模范。”李向东拿出一个至今仍在用的白色搪瓷缸，这是他父亲被评为什么生产者的奖品。

那个年代，工厂里最牛气的是那些老劳模。每次开会，他们都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他们每到一处维修机器、解决技术难题，厂长都要亲自出面迎接。

当劳模的另一个待遇，是有机会住进“工人村”。

“工人村”是当年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之一，143栋“苏式三层砖起脊闷顶”楼房连成一片，蔚为壮观。只有劳动模范、高级技术工人才有机会住进去。上个世纪70年代末，“工人村”成为沈阳首批向外国人开放的地区，仅1978年，就接待了47个外国参观团。

如今，在位于铁西区赞工街的“工人村生活馆”里，依然能看到当年的生活图景。屋内放着三屉桌、双人木床，桌上摆着老式收音机，墙边放着缝纫机和自行车。每栋楼配有自己的水、煤气、暖气。楼里有“工人村大合作社”，百货、蔬菜、熟食、海鲜等一应俱全。还有配套的照相馆、卫生院、储蓄所、幼儿园。

据辽宁统计年鉴显示，1978年，辽宁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人均GDP水平的177%。凭着“国营工人”的身份，李向东结识了现在的爱人。结婚后，两人住进厂里分的114平方米的一居室。一个大门里两间屋子，一个屋子住一家四口，厨房、卫生间两家共用。

艰难岁月

随着市场经济席卷而来，习惯了按计划和指令生产经营的国有企业开始受到冲击。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当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在当时，这无异于一声惊雷，以至于有外媒惊呼：“中国的‘铁饭碗’真的要被打碎了！”

“干得好好的，怎么说破产就破产了？”当时的李向东并不太明白正在发生的改变。

一直到1996年，他所在的沈阳鼓风机厂一下子亏损了6000万元，李向东才意识到危机已经降临。工厂的产量越来越少，工资发放周期越来越长，最后3个月才发一次，拖欠的数目一增再增。这期间，在沈阳机床三厂工作的李向红、李香琴，在沈阳拖拉机厂工作的董志国都陆续收到了“下岗通知书”。

由于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等多重原因，上世纪90年代，全国出现了国企员工下岗潮。当时，铁西区30多万产业工人中，有13万人下岗。“工人村”变成了“工人度假村”。

“来，干一个！”2018年9月22日，中秋佳节，李向东一家子在铁西区的一家火锅店聚餐，15个人坐满了一桌。

“2000年我下岗，30年的工龄啊，彻底和厂子脱离关系。公婆瘫痪在床，因为拿不出儿子200元的住宿费，吵了一周的架，天天晚上抹眼泪。后来去昌市场找零工，擦玻璃、刷油漆，人多，一周等不来一份活儿。”李向红往杯里续了点啤酒，眼睛有些泛红。

那时，李向东一家人都在寻找出路。

觥筹交错中，李香琴提到了恩人黄大妈。黄大妈叫黄凤珍，是沈阳市铁西区兴工九委街道居委会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她和老姐妹们帮助了很多下岗职工进行再就业，仅2003年就安置失业人员1009人。

当时，李香琴和丈夫双双下岗，儿子读高中，两口子想开个理发店，可就是借不来本钱。李香琴经常以泪洗面。

黄大妈安慰她说：“哭啥呀，这点事，大妈帮你想想办法。”租不起房子，黄大妈把一处走廊拐角隔出来给她用，没执照，黄大妈拿起尼龙绳子、大夹子一趟一趟；没本钱，大伙儿捐出板凳、镜子和脸盆；黄大妈还带头去理发，“闺女大胆剪，就拿俺练手。”

个人在找出路，企业也在求突围。李向东还记得，表哥在一家工厂上班，他们试图生产销售电话机来挽救亏损的命运，但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不允许工厂以市场化的方式生产出售。

尽管如此，大部分职工还是选择坚守。企业生产的东西得自己找销路，每个职工包括他表哥在内，白天上班生产，晚上就背着电话机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东拼西凑为企业谋效益找销路，工资才勉强发了几个月。

改革了，才能重生

“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工业呢？咱们工人有技术、有力量，艰难日子会到头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向东也没动摇过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他没离开企业，还说服工友留在企业搞创新。

2002年，沈阳低压开关厂的拆迁，拉开了铁西工厂“东搬西建”的序幕。“东搬西建”就是把部分老企业从铁西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地价差获得资金，帮助老企业安置职工、转换机制、改造技术。

一年之后，中央正式提出振兴东北计划，“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要致力于解决机制性矛盾、结构性矛盾”。

那时，李向东和董志国这些铁西的老工人们，都去

从老铁西区到新铁西区，从烟囱林立到商圈繁华，从曾经的荒地到如今的企业聚集，一路向西，人们遇见“东方鲁尔”的变迁；

从创造数百个全国第一到走向没落，从寻求突破到涅槃重生，从艰难转型到奋力振兴，一路走来，铁西区折射的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百转千回”；

三代铁西职工，40载命运沉浮，透过一个大家庭经历的点点滴滴，得以窥见一段坚守、改革、创新的进行史。



改革开放之初的铁西区俯瞰图。



那个年代，工人们每天要围着三尺机台转，工作服上满是油渍。

去年，李文斌所在的企业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沈阳机床集团综合改革试点成为国家八部委共同批准的唯一地方样本。改革在继续深化。

为了支持企业创新，把人才引进来，铁西区政府实施“铁西安家”计划，设立1亿元人才发展专项基金，配套出台创业型高精尖人才每月4500元专车补贴、未就业高精尖人才配偶每月2000元生活补贴、50元入住人才公寓、个人所得税补贴等17项实施细则。

周勇便是引进来的人之一。

38岁的周勇是李向红的儿子，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北漂了10年。5年前，他回到了铁西老家。“都

知道铁西在工业上有很好的基础，工业产值占整个沈阳的40%，可以说是沈阳工业的风向标，但铁西的科技属性相对较弱。我希望能在这方面给工业企业增加活力。”

2017年，周勇加入沈阳金谷科技园一家专为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提供支持的工业大数据公司。金谷科技园位于铁西区北一路重工街附近，目前已有上百家

科技、金融和生产服务业企业入驻。

在周勇看来，铁西的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工业2.0阶段，单纯重视资金和业务开展，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严重不足。“比如，当地不少企业至今仍在使用人工方式对高空设备进行检查，而在江浙、广东一带，通过无人机、数据建模进行类似诊断的情况已经很多了。”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勇说，现在不是那个只管低头干活的年代了，要学会抬头看路，“政府、企业、职工一起使劲，才能让铁西工业再上一个台阶。”

除署名外，本版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的鸟瞰图。